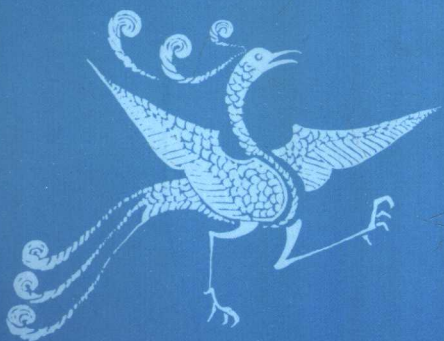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六朝論語學研究



宋
钢
著

本书对六朝论语学代表著作《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和《论语义疏》进行纵贯式研究，寻绎其联系和变化的轨迹，归纳和总结论语学在第一个收获期的主要特点、重大成就和从“汉学”到“宋学”转变过程中的突出价值；系统梳理两汉至六朝论语学的发展脉络，整合汉儒与六朝学者的论语学观念和思想，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较汉儒与六朝学者论语学研究的异同得失；探讨自汉至六朝论语学的继承和新变特点及其规律；钩沉和整理有关论语学资料，阐发六朝论语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及其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六朝论语学研究

宋 钢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论语学研究/宋钢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9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978 - 7 - 101 - 05853 - 6

I. 六… II. 宋… III. ①论语 - 研究②儒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4643 号

书 名 六朝论语学研究

著 者 宋 钢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8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9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853 - 6

定 价 38.00 元



宋钢, 1963年生, 内蒙古河套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学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入选内蒙古“111工程”第三层次重点培养人才, 2004年起任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生导师。现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先后主持完成两项省部级项目, 其中《〈中说〉校释点评》于2000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青年奖。出版学术专著3部, 主编学术著作3部, 发表论文40余篇。

责任编辑：高 天
封面设计：周 玉

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博库书城 www.bookuu.com
当当网 www.dangdang.com
卓越网 www.amazon.c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而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则成为后人的必读书和安身立命的根本,于是《论语》便成了中华文化中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一。它不仅对许多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贯穿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甚至早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和由他创立的儒家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后代讲解、阐释、研究《论语》的人甚多,取得的成果蔚为大观,从而使《论语》研究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论语学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巨,罕有其匹。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论语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并不多见,撰述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在经学研究史一类的著作中才粗略地涉及,尚缺少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宋钢君的博士学位论文《六朝论语学研究》就具有了原创性的价值。

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①,同时“魏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时代,是汉至唐文化思想演化的关键时期”^②。在论语学史上,六朝是论语学的成型和成熟时期。完成于该时期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使论语学真正进入了学术层面。可以这样说,是产生于六朝的这几部论语学代表著作,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唐前论语学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构成了论语学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从历时性来说,他们不仅在诠释方

①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②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法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都表现出有别于前代学者的崭新面貌;就共时性而言,他们彼此之间又体现出既相互联系亦各自区别的不同形态。寻绎论语学的发展规律,总结前人《论语》研究的方法与特点,即开展对《论语》研究之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选择“六朝论语学”作为研究课题,可见出宋钢君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可贵的学术勇气。从事学术史研究,又必须要具备丰厚的理论素养和坚实的文献功底,宋钢君因为具有这方面的特长,所以能够比较自如地完成他的撰述。

本书在六朝思想文化背景下,选取《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和《论语义疏》为主要研究对象,寻绎其联系和变化的轨迹,归纳和总结论语学在第一个收获期的主要特点、重大成就,及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特别是从“汉学”到“宋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较汉儒与六朝学者论语学研究的异同得失,探讨自汉至六朝论语学的继承和新变的特点及规律,从整体上把握此时期论语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本书在广泛借鉴宿彦今贤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获,兹列举数端如下:

一、从《论语》的得名和内涵、《论语》作为“语”类著作的文体特征、通行文本形成之前《论语》的存在方式三个方面,以及在与“孔学”、“儒学”、“经学”的联系和区别中,廓清了论语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论语学作了新的界说。

二、对“六朝”作了新的界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六朝”这一新的概念,认为“文化六朝”所指称的不再是几个具体王朝赖以立足的地理方位或得以存在的政权组织,而是由若干王朝连缀而成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历史区间,其实质是以思想文化来体现的。

三、对何晏在生活、政治、学术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和评价,作了细致的分析和全面的清理,力图还原何晏的真实形象,并恢复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厘清了文献关于《论语集解》作者的记载中所出现的混乱和偏失,确定《集解》的作者仍应以何晏为是;提出《集解》成书时间当在公元236年至249年之间的论断。

四、首次对包括何晏在内的《论语集解》所收八家注进行统计分析,全面归纳和总结了《集解》的特点、价值及其在论语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五、通过对《论语释疑》与《论语体略》的平行研究,勾勒了从汉儒

经验论阐释方法到六朝玄学家本体论阐释方法的演变过程,积极评价了玄学本体论在儒家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中的重大作用,充分肯定了玄学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六朝论语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六、对《论语义疏》的体例、文本价值和“义疏”之体的生成、演变及其在古典阐释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总之,这是一篇很厚重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论文答辩时得到了专家的一致首肯和高度评价。在这里,我愿意借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来印证我的上述看法:

宋钢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六朝论语学研究》,就国内学术界而言,是首次从学术史角度对论语学所作的专门研究,在选题上富有开拓创新的意义。论文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对六朝论语学的发展脉络,重要成果的学术成就及其地位、影响,继承与创新的突出之处等,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既有具体的现象分析,又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既有对有关学者、论著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的横向剖析,又有对六朝论语学的整体性、规律性的纵向展示,论述细致,不乏识见。

该论文语言平易畅达,广泛参考前人成果,时出己见,显示出良好的学风,是一篇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优秀之作。

当然,“六朝论语学研究”还只是整个论语学史的一个截面,作为全部学术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论语学,仍然还有广阔的拓展空间,希望能不断看到宋钢君后续的研究新成果。

宋钢博士勤奋笃实,作风严谨,专业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开阔,在学术研究上很有潜力。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能达到这样高的学术水准,作为导师,甚感欣慰。在论文付梓之际,说了以上这些话,聊以为序。

张采民

2007年5月18日于心远斋

目 录

序	张采民 1
第一章 导论:六朝的思想文化	1
第一节 文化六朝	2
第二节 六朝思想文化特点	8
第三节 对六朝思想文化的认识和评价	20
本章小结	25
第二章 论语学界说	28
第一节 论语学概念的出现	28
第二节 论语学界说	31
本章小结	48
第三章 《论语集解》研究上(综述篇)	50
第一节 何晏生平、学术及其评价	50
第二节 《论语集解》的作者及成书时间	66
第三节 《论语集解》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73
第四节 《论语集解》记载失误考论	82
第四章 《论语集解》研究下(专题篇)	
——《论语集解》八家注统计分析	86
第一节 《集解》所见汉儒《论语》注研究	90
第二节 《集解》所见魏世学者《论语》注研究	118
三、四章小结	137
第五章 《论语释疑》、《论语体略》研究	140
第一节 王弼的《论语释疑》	145
第二节 郭象的《论语体略》	160
本章小结	173
第六章 《论语义疏》研究	177

第一节	皇侃生平与学术	177
第二节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181
第三节	《论语义疏》的体例	187
第四节	《论语义疏》的价值	192
第五节	《论语义疏》的地位与影响	208
第六节	《论语义疏》记载失误考论	210
本章小结		212
附录	《论语集解》八家注分辑	215
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7

第一章 导论:六朝的思想文化

历史是流动的,不是凝固的,因而历史是联系和连贯的,不是孤立和割裂的。用省事的方法,将历史人物简单地系于某个具体朝代下边的做法,是思想懒惰的表现,不仅是粗浅鄙陋的,而且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刘跃进认为:“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总有一个发生、发展、变化、成熟、衰落的过程。以往的文学研究往往过于恪守政治制度的划分,人为地把流动的文学发展过程,机械地分为几大块,比如讲两汉文学,就把目光盯在刘邦登基后到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而讲魏晋南北朝文学,顶多始于曹操出生的汉桓帝的永寿元年(155),而终于隋文帝平陈的589年,最多讲到隋代末年。实际上,文学的发展虽然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但是它毕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虽与政治制度有关,但是并非机械地随之变化而变化。士人阶层的崛起及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①贺昌群则说:“每一时代皆有其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继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他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②

勿庸讳言,在以往对六朝文学、学术乃至思想文化的研究中,确实像刘跃进先生和贺昌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不是将条块分割得太仔细,就是把泾渭区别得太分明的情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六朝思想文化的整体性、丰富性及其连贯性的掘发。在学术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因此,在梳理六朝思想文化背景之前,先对“六朝”的概念加以重新说明,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在对“六朝”的概念赋予新的阐释的基础上,用

① 刘跃进《雄风振采——中华文学通览·汉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页。

② 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文化六朝”这样一个新的术语来描述此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之所以提出此一概念,是因为在我看来,只有用这样一个涵盖面既广又较富弹性的词汇才能有效地整合此一时期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使我们的研究更接近事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还原历史将比歪曲历史更困难,当然也就更有价值。

第一节 文化六朝

一、关于六朝

在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文献中,下面两种文献关于“六朝”的记载,是较为权威而且影响较大的。

1.《历代都会考》曰:“吴始都于建业,后东晋、宋、齐、梁、陈皆都焉,号六朝。”这是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六朝”概念。

2.《中国历史大辞典》^①“六朝”条曰:“时代名。(1)又称六代。即南朝六朝。三国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先后建都于建康(吴称建业,今江苏南京),史称六朝。(2)即北朝六朝。三国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及隋皆建都于北方,亦合称六朝。(3)后世对三国至隋统一前南北两方的泛称。”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义项,在这里,编纂者显然赋予了“六朝”这个概念较为宽泛因而也更具包容性的涵义,表现了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这种对“六朝”涵义的拓展,是意味深长的。

不难看出,《历代都会考》所说的“六朝”,是狭义的六朝;《中国历史大辞典》“六朝”条的第三个义项,差可算作广义的六朝。那么,狭义和广义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凡着眼于地理方位且主要用来指称或在南方或在北方建立的具体的六个政权朝代的都属于狭义六朝;与此相对,凡不局限于狭窄的地理方位、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并且概括地指称从汉末到隋统一前的这一区间的历史的都属于广义六朝,或通俗地称之为大六朝。

^① 《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7页。

“六朝”之说,早在唐代就已有之。“六朝”概念的演变,以李天石和许辉的梳理较为明晰。他们认为:“‘六朝’之专称,在隋灭陈以后的数十年里尚未见之于现存文献记载。因此,在隋代,可能还没有特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之专称,即或偶有此称,也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和沿用。‘六朝’一词大量出现在文献中,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中期以后。当时所称‘六朝’,已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①“古时人们亦有将三国与六朝连称者,如《宋史·艺文志》载有宋代胡寅著《三国六朝攻守要论》。南宋孝宗时太常博士上言:‘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事而自己终之。’这里的‘三国六朝’,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六朝而不包括蜀汉与曹魏。一直到清代,人们仍习惯上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统称为‘三国六朝’。”^②“当然,古人也有将整个魏晋南北朝统称为‘三国六朝’的,如清嘉庆时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书,书名中所讲的‘三国六朝’,实际上包括魏晋南北朝整个历史时期。书中所收文章的时代,并不限于南方六朝,而是既包括南方‘六朝’,也包括南方蜀汉、北方曹魏、西晋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隋等在内的所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③“近代以来,‘六朝’实际上仍存在着两个层次上的概念。一种概念专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六朝。另外一些学者仍使用广义上的大‘六朝’概念,即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笼统称为‘六朝’,特别是日本学者多用此概念。如日本学者编《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一书,其魏晋南北朝、隋唐一章即称为‘六朝、隋、唐’。这里的六朝系指广义的大‘六朝’。”^④

将上述材料加以整理和归纳,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就我国学术界来说,人们对六朝这个概念的理解,越往后越宽泛;其二,就国际学术界来说,外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六朝这个概念的界说,比中国学者更宽泛,体现了更为开阔的学术眼光;其三,六朝的涵义经历了从政治意义逐步向文化意义演变的过程。因此,不仅仅将“六朝”这个概念定位于地理方位及具体的政权朝代,而是更多地关注其思想文化的共同特点及其内在联系,使其呈现出流动的、弹性的色

① 李天石、许辉编著《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第1~2页。

② 同上,绪论第5页。

③ 同上,绪论第5页。

④ 同上,绪论第6页。

彩,将更有助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为此,我们有必要用“文化六朝”这个新的词汇来统领和涵盖此一历史区间,应该说其科学性和客观性会更强。

二、文化六朝

“六朝”的概念,除了是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还可以是思想和文化意义上的。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学术史上不乏实例。如“建安七子”这样的提法,也是缘于思想、文化特点的考虑而出现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几乎成了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尽管有些学者仍不断对此提出这样那样的辩正乃至质疑,但基于思想文化特点的这种描述,却自有其立论的基础。究竟用什么样的术语来指称汉末至隋这一历史区间更为合适,我们觉得借鉴文学史上类似的做法是大有裨益的。人们或许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曾引发过一场对白话文学(或曰新文学)不同时期如何称谓的争论。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从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的文学叫做现代文学,把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的文学叫做当代文学,而把1978年以来的文学叫做新时期文学。众所周知,这种描述虽然各自有其合理性,但却比较僵化,缺乏弹性、包容性和整体性。表面看,似乎只是称谓不同,但问题也就在这里。称谓的区别,已经无形之中把白话文学的连续性无情地截断了。当历史的整体被分割成历史的碎片之后,历史还是有机历史和鲜活的历史吗?历史的复杂性又如何体现呢?如果不顾这些基本的事实,那么,那些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留下足迹并产生影响的不少作家,他们到底该属于哪一时期,描述起来就很不好办。比如像巴金、曹禺、艾青、冰心等这样的高寿作家,在文学史中到底应该放在哪一时期呢?总不能说到巴金时,一会儿说现代文学中的巴金,一会儿说当代文学中的巴金,一会儿说新时期文学中的巴金,倘若真是这样,巴金还是那个完整而真实存在着的巴金吗?为此,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用一种较富智慧的方法,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以此取代了上述种种不同说法,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结束了那场无谓的争论。所以说,按特质和性质去划分事物比按现象和表象去划分事物更具有合理性。当我们的文学史家或文学批评家们习惯于按照具体时间或朝代去划分文学社团和作家流

派的时候,其实他们早已将活生生的历史与事物的联系性肢解得不成样子了!可怕的是,这种偷懒的、割裂历史的做法却几乎成了深入人心的普遍规则。大家不仅就这样去相信它,而且还乐此不疲地去坚持它甚至延续它。

“文化六朝”概念的提出,即是基于上述文化事实而来的,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使用这一概念才能有效地整合该时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把它作为一个区别于“建安文学”、“魏晋文学”、“南北朝文学”等这些过于具体因而也显得有些局限的概念。王瑶先生指出:

苏轼《韩文公庙碑》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愈自己也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是古文家的态度。清刘逢禄有《八代文苑》,陈存哲有《八代文粹》,陆奎勋有《八代诗揆》,张守有《八代诗淘》,王闿运有《八代诗选》,又都是以“八代”为宗尚的。本书所讨论的各问题的时代,起于汉末,迄于梁陈,大略相当于旧人所谓“八代”的范围。名为《中古文学史论》,是沿用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习惯称法,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我们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散宗骈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昔人之所以用“八代”、“六朝”这些字样,也正表示出这四百年多的文学史是有它底共同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分期。^①(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尤其像马融、郑玄、何晏、王肃、陈群等,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汉末魏晋之交,简单地将他们算作东汉人或魏晋人,似乎都不妥当,而从思想文化角度,将他们划作六朝学者,却更符合当时和后来的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马融出生于79年,卒于166年,主要生活在东汉中期;郑玄是马融的学生,出生于127年,卒于200年,主要生活在东汉中期和末期;王肃是以郑玄经学批判者的身份出现的,出生于195年,卒于256年,横跨汉魏;作《论语集解》的何晏,一般认为,他的生年是190年前后,于249年被杀;陈群生年不详,卒于236年。从时间上看,他们或是先后相续,或是比肩共事(如王肃、何晏、陈群等),不只覆盖

①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了东汉的半数,而且一直延续到魏晋。所以,一定要把时间间隔如此之短的汉末这几位学者与魏晋几位学者机械地分为汉代和魏代,显然没这个必要。历史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事实上,从郑玄到何晏,他们虽然分属于不同朝代——一个在汉代,一个在三国,但他们却仍然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也就是说,朝代的不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不同,而这恰恰是以往的差不多所有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共同的错觉。王朝不同,其政治制度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思想文化的变化并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政权是浅层次的、激变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思想文化是深层次的、渐变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可以感受得到。换言之,思想文化即使有变化,一般来说,也不可能像现实的政治制度变化得那么快,而是更多地呈现出渐变和递变的状态。具体说,就是前代的东西凭借惯性要自然延续到后代,而后代则依据省事原则必然承继前代的遗产。可以说,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强调用思想文化的元素来描述历史,而不是用政治王朝的元素来描述历史,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接近历史本身,而且也较充分地体现出历史的内在性和连续性。那么,六朝的概念往前延伸至汉末,往后延伸而至隋朝,自然也未尝不可。在这里,界限模糊一点儿反倒准确,界限准确一点儿反倒模糊。其实在七八十年前的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种观念突破的尝试就已经开始了。如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世传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都建康,是为六朝。其文词日趋绮靡,以排偶声调相尚,故世称其文体为六朝文。若以此论文学,此语固甚确切。惟孙吴雄据江南,人才号称鼎盛,以言文章,并无特殊之建树。至于骈文之极峰庾信,北渡仕周,亦难尽属之于南朝,与其谓为六朝文学,毋宁谓为南北朝文学。然沿用既久,因袭为宜,且骈文作家,亦率以南朝称盛,固不妨以六朝文溢之矣。”^①事实上,刘氏正是试图以文化(按此处具体表现为文学)为媒介或主线来贯通南朝六朝和北朝六朝的,而不再拘执于以政权王朝的界域作为把握和衡量文学的标尺。刘大杰《魏晋思想论》说:“魏晋时代,无论在学术的研究上、文艺的创作上、人生的伦理道德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与自由。”^②这种解放与自由,

①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②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难道是空穴来风吗？刘跃进评述曰：“马融自己曾著有《三传异同说》，又注《孝经》、《论语》、《诗经》、《三礼》、《尚书》、《离骚》，被世人看作‘通儒’。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著名的儒家大师，其言行表现却与传统儒家思想极不协调。譬如说，他‘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给弟子上课，而后屋却蓄女乐；弟子以次相传，很少有人入其室中。又儒家崇尚节俭，而马融却‘居宇器服，多存侈饰’。更令人惊异的是，在遍注儒家经典的同时，他又为《老子》、《淮南子》作注，而这些书在当时不为正统儒生所看重。马融的这些怪异言行已经超出了正宗的儒家范式，而与后来的魏晋风度颇有几分渊源关系。在他身上比较典型地体现出了汉末世风转变的某种迹象：传统正宗的儒家思想实际已经逐渐为过去被视为异端的老庄思想所替代。”^①宗白华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能、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②宗白华先生在这里将汉末魏晋六朝连言，则分明已有将三者视为同一整体的意思了。他虽然没有使用“文化六朝”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其实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文化六朝”这一概念的提出，除了上面所说的理论意义之外，重要的是，它还具有实践的价值。以论语学研究为例，为《论语》作集解的何晏，因为与马、郑等属于同一时代，所以其见诸《集解》的学术思想与马、郑等汉儒相比，表现更多的是同而不是异，是因而不是革。相反，从何晏的《集解》到皇侃的《义疏》，由于其间已跨越了三国、两晋和南朝的前两个朝代，从时间上说，超过了三个世纪，不仅政治制度、社会风尚，就是思想文化，其形态也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因而，皇侃的《义疏》不论是疏经方式，还是阐释思想，比之三百年前的何晏的《集解》都有很大的不同。何晏“并下己意”之处，尽管在某些地方不无援道入儒的味道，但在总体上仍然沿袭的是汉儒依经立意、注不驳经的老路。说起来确实同汉儒没有什么差异，至少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虽是分属不同的朝代，却仍处于同一时代。因此，从汉儒到何晏，比之从何晏到皇侃，变化自然就要小得多。一个是汉学的继续及其继续中略有微变，一个是

① 刘跃进《雄风振采——中华文学通览·汉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页。

②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